

大运河文化带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 错位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厉建梅,赵苗祎*,李 曼

(郑州大学 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大运河文化带沿线的传统村落与非遗是大运河重要的文化资源,判别二者的空间关系及影响因素,实现二者协同发展是生动展示、活态传承千年运河文化底蕴的重要条件。以大运河文化带沿线 36 个地级市及以上行政单元为研究区域,利用核密度、重心模型、空间错位指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大运河文化带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空间错位问题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传统村落与非遗虽均呈现集聚的分布态势,但集聚分布的空间重叠度在北方较低。2)传统村落与非遗存在明显的重心偏离,且重心偏离程度较大,地区之间差异显著。3)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空间错位以低错位类型为主,中高错位类型为辅,呈橄榄型分布模式。4)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空间错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政府主导、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地形地貌是主要影响因素,因子间交互作用的解释力大于单独作用时的解释力。

关键词: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运河文化带;空间错位

中图分类号:G124;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4)02-0050-10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传统村落是指形成较早,拥有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1]。它承载着我国农耕文明的文化遗产^[2],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3],更是寄托游子乡愁的重要载体^[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由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5]。根据学者统计,传统村落涵盖了我国 73%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6]。千百年来,在大运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一些饱含着运河遗产的传统村落也随之兴盛。大运河文化带沿线 36 个市级以上行政单元含有的传统村落数量占全国总量的 6.7%,国家级非遗数量占全国总量的 16.9%,资源丰富,底蕴深厚。但在

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传统村落面临着物质文化破坏、非物质文化缺乏活力等问题^[7],制约着大运河文化带的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厘清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空间关系,加强传统村落与非遗的整体保护与科学合理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传统村落作为研究对象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随着开平碉楼等村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及众多保护传统村落的文件出台,学界对传统村落的研究热情高涨,研究成果纷纷涌现^[8],主要集中在传统村落与乡村振兴^[9-10]、传统村落文化景观^[11-13]、传统村落旅游活化^[14-15]以及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16-17]等方面,尤其在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方面,研究成果颇丰。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遗保

收稿日期:2023-08-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带一路’背景大运河世界遗产的保护与当代价值重构研究”(18CGL04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近代中国文物保护体制创建研究”(20BZS076);2022 年河南省兴文化工程专项“隋唐大运河的文化变迁与保护传承研究——以洛阳段为例”(2022XWH227)

作者简介:厉建梅(1983-),女,郑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遗产旅游、文化旅游;赵苗祎(2000-),女,郑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旅游。E-mail:zmy815815@163.com

* 通讯作者:赵苗祎

护与传承^[18-20]、非遗与旅游的融合^[21-22]、非遗的经济社会价值^[23-25]以及非遗的空间分布特征^[26-28]等方面。我国传统村落和非遗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空间相关性及其影响因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田磊等^[29]研究表明黄河流域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空间关联显著,并且这种空间相关性的形成受到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李如友等^[30]指出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和非遗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错位特征,传统村落集中分布在长江以南,而非遗集中分布在长江以北的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上述研究揭示了黄河流域和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空间关系和影响因素。但鲜有研究论及大运河文化带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空间关系并阐释影响因素。因此,本文以大运河文化带沿线36个地级市及以上行政单元作为研究区域,采取重心模型、空间错位指数等方法,探究大运河文化带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空间错位关系,并剖析二者空间错位形成的影响机制,以期为大运河文化带传统村落与非遗的整体保护与协同利用提供依据,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发展。

二、研究方法 with 数据来源

1. 研究区域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现有和历史上最近使用的河道构成,大运河文化带以大运河流经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8省(市)为规划范围。”划分大运河文化带的核心区、拓展区和辐射区,分别指大运河主河道流经的县(市、区),地市,省(市)^[31]。因此,为全面精准反映大运河文化带流经区域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错位特征,本文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中明确的36个大运河沿线地级及以上市域作为研究区域。

2. 数据来源

本文传统村落数据来源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根据研究区域,计入本研究的传统村落共542个。非遗数据来源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公布的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根据研究区域进行汇总整理,纳入本研究的国家级非遗数量共为612项。传统村落与非遗的地理坐标根据传统村落的地理位置与非遗保护单位的地理位置,利用百度坐标拾取器获取。大运河文化带沿线36市及以上行政单元的底图来源于全国地理信息目录服务系统。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各市2021年统计年鉴与2022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地形地貌,气温、降水量数据来源于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

3. 研究方法

(1)核密度分析。核密度分析是测量观测对象在其周围邻域中密度的非参数估计空间分析方法,可以直观地反映地理要素的空间集聚状态^[30]。本文利用核密度分析探究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空间集聚状态。其公式为

$$f(x) = \frac{1}{nh} \sum_{i=1}^n K\left(\frac{x - X_i}{h}\right) \quad (1)$$

式中: $K(x)$ 为核函数, $h > 0$ 为带宽, $(x - X_i)$ 为估值点 x 到非遗点 X_i 的距离。

(2)重心模型。重心模型是探讨区域地理要素空间演化的重要分析工具,通过计算地理要素重心偏离的距离与方向,清晰地反映区域地理现象的空间差异及其动态过程^[32-33]。本文利用重心模型探索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空间错位情况。其公式为

$$X = \frac{\sum_{i=1}^n L_{ixi}}{\sum_{i=1}^n L_i} \quad (2)$$

$$Y = \frac{\sum_{i=1}^n L_{iyi}}{\sum_{i=1}^n L_i} \quad (3)$$

式中: X 、 Y 为传统村落或非遗的重心的经纬度坐标, x_i 和 y_i 为大运河文化带沿线36个市级及以上行政单元的经纬度坐标, L_i 为 i 市的测量指标值, n 为研究区域个数。

由于重心模型只能从宏观角度反映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空间地理位置,但不能具体判断二者间的空间错位情况,因此,需要借助空间重叠指数 S 进一步分析二者重心间的距离^[33]。其公式为

$$S = K \sqrt{(X_a - X_b)^2 + (Y_a - Y_b)^2} \quad (4)$$

式中: S 为传统村落与非遗重心之间的距离,常数 $K = 111.111 \text{ km}/(^{\circ})$, X_a 、 Y_a 为传统村落重心点的经

纬度, X_b 、 Y_b 为非遗重心点的经纬度。 S_0 表示传统村落与非遗的重心不重叠, 存在一定的空间错位情况。 $S=0$ 表示传统村落与非遗的重心重叠, 二者空间分布具有一致性。

(3) 空间错位指数。空间错位指数是基于空间错位理论提出的, 从微观层面出发揭示要素之间不协调的发展状态^[34]。本文利用空间错位指数对大运河文化带沿线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空间错位程度进行分析。具体公式为

$$SMI_j = \frac{1}{P_j} \left[\left(\frac{e_{ij}}{E_j} \right) P_j - P_{ij} \right] \times 100 \quad (5)$$

式中: e_{ij} 为大运河文化带沿线第 j 个城市的传统村落数量, E_j 为大运河文化带传统村落总数, P_{ij} 为大运河文化带沿线第 j 个城市非遗的数量, P_j 为大运河文化带非遗总数。

为计算各市对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城市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空间错位的贡献率, 引入贡献度模型探究主要错位区^[33-35], 公式为

$$G_i = |SMI_i| / \sum_{i=1}^n |SMI_i| \quad (6)$$

式中: G_i 为 i 市对空间错位指数的贡献率, SMI 为 i 市的空间错位指数。

(4) 地理探测器。地理探测器是探测和利用空间分异性的工具, 用以解释两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本文使用地理探测器解释大运河文化带非遗分布特征的影响因素, 计算公式为

$$q = 1 - \frac{\sum_{h=1}^L N_h \sigma_h^2}{N \sigma^2} = 1 - \frac{SSW}{SST} \quad (7)$$

$$SSW = \sum_{h=1}^L N_h \sigma_h^2, SST = N \sigma^2 \quad (8)$$

式中: $h=1$, L 为变量 Y 或因因子 X 的分层 (strata), N_h 和 N 分别为层 h 和全区的单元数, σ_h^2 和 σ^2 分别是层 h 和全区的 Y 值的方差。 SSW 和 SST 分别为层内方差之和和全区总方差 (total sum of squares)。 q 的值域为 $[0, 1]$, 值越大说明 Y 的空间分异性越明显, 该变量的解释力越强。

三、空间特征与错位关系

1. 空间特征

(1) 传统村落空间特征。从分布地区和数量来看, 大运河文化带传统村落地区分布不均衡, 邢台

市传统村落数量最多, 为 75 个, 其次是杭州市和邯郸市, 分别为 65 个和 56 个, 3 市分别占到总数的 13.83%、11.99% 和 10.33%。北京市、苏州市、宁波市、绍兴市、洛阳市、安阳市、鹤壁市传统村落数量在 25 个以上, 占大运河文化带总数的 38.92%。沧州市、廊坊市、宿迁市、淮北市、宿州市、德州市、聊城市以及商丘市传统村落数量为 0, 对传统村落的调查和保护工作亟待提升。

从核密度分布来看 (图 1), 大运河文化带传统村落形成了一个高密度核心分布区, 主要包括河北省邢台市、邯郸市以及河南省安阳市。相较于北方形成的高密度核心分布区, 杭州市、绍兴市、宁波市、苏州市等形成了一个小核心区。传统村落的集聚程度总体表现出“中间高, 南北低”的特征, 且大运河文化带沿线的传统村落多分布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平原和丘陵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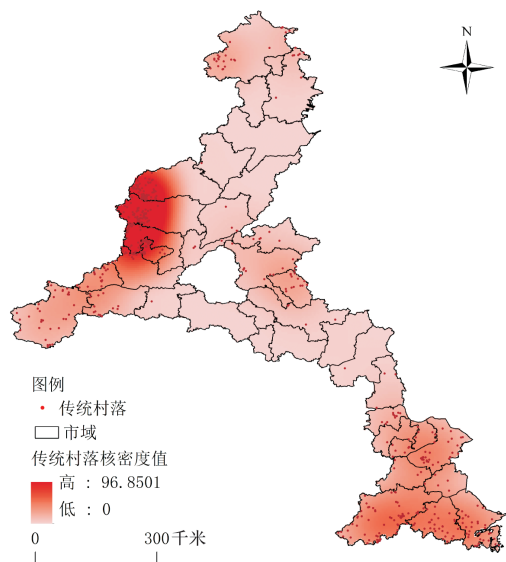


图1 传统村落核密度分布

(2) 非遗空间特征。从非遗的分布地区和数量看, 大运河文化带非遗呈现“南北密, 中间疏”的特征。北京市非遗数量最多, 为 120 项, 占到大运河文化带非遗总数的 19.60%, 其次是杭州市和天津市, 分别占到总数的 8% 和 7.67%。另外, 非遗数量较多的市域包括苏州市、宁波市、邯郸市、绍兴市等, 衡水市、宿州市、鹤壁市、新乡市等非遗数量较少, 淮北市非遗数量最少, 仅有 1 项。

从利用核密度分析得出的可视化结果可以看出 (图 2), 大运河文化带沿线非遗在北方以北京市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高密度核心分布区, 辐射至廊坊

市、天津市、沧州市等其他地市。在南方以嘉兴市、杭州市、绍兴市、宁波市、湖州市、苏州市6市交界处形成了一个次高密度核心分布区,并且辐射到了无锡市、常州市、扬州市等市。非遗的集聚程度总体表现为“南北高,中间低”的特征,同时非遗多分布在文化积淀深厚、人口密度大的平原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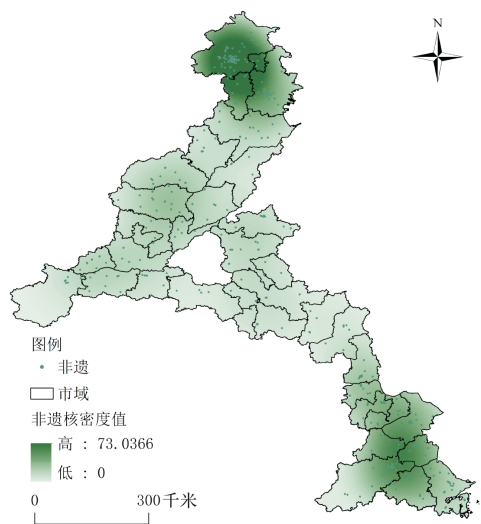


图2 非遗核密度分布

2. 错位关系

(1)重心偏离分析。为能更好的从宏观视角描述大运河文化带沿线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空间关系,本文利用重心模型计算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各市传统村落与非遗的重心坐标与偏离距离(表1)。因廊坊市、沧州市、商丘市、宿州市、淮北市、德州市、宿迁市7市传统村落数量为0,故不计入重心偏离分析。结果表明,大运河文化带传统村落与非遗分布的重心位置存在明显的偏离,传统村落的重心(116.640 115E,34.235 811N)位于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境内,非遗的重心(117.477 042E,35.315 335N)位于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境内,而大运河文化带的几何重心(117.038 107E,34.534 305N)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沛县境内。传统村落的重心位于几何重心的西南,非遗重心位于几何重心的东北,三者连线近似一条直线,且偏离距离达到了151.772千米。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各市传统村落与非遗均存在一定的空间偏离情况,并且偏离程度存在着地区差异。杭州市偏离距离最大,为91.437千米,安阳市和洛阳市的偏离距离分别为87.437千米和77.670千米,位列第二和第三。偏离距离最小的是焦作市,为7.736千米。总体而言,大运河文化带沿线传

统村落与非遗重心偏离的程度较大,地区差异明显。

(2)空间错位指数。由于重心模型只能从宏观角度判断传统村落与非遗的错位情况,并不能具体分析传统村落与非遗在各市的空间错位现象与分布状况,因此引入空间错位指数对大运河文化带沿线传统村落与非遗的错位情况做进一步探究分析(表2)。借鉴前人的研究^[30-33],根据SMI值的大小,将大运河文化带36市划分为6类区域(图3)。分别是:正向高错位区(SMI4),正向中错位区(4SMI2),正向低错位区(0SMI2),反向低错位区(2SMI0),反向中错位区(4SMI2),反向高错位区(SMI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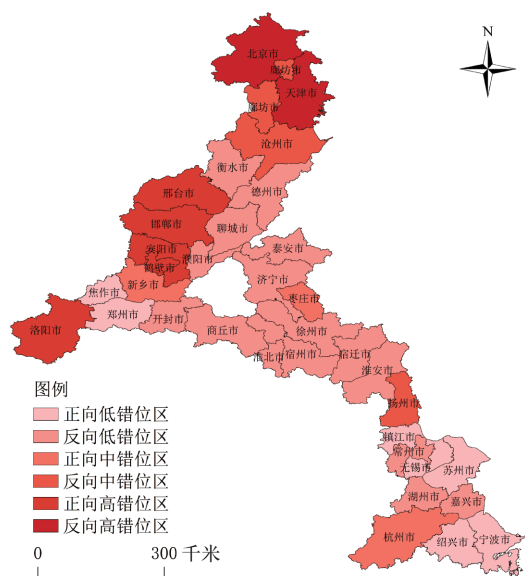


图3 传统村落与非遗空间错位类型

从错位方向来看,正向高错位区包括邯郸市、邢台市、安阳市、洛阳市、鹤壁市,正向中错位区包括新乡市、杭州市、枣庄市。这些地区传统村落分布规模优于非遗分布规模,传统村落的数量较多,非遗的数量较少,还需加强对非遗的调查和保护工作。反向高错位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反向中错位区包括廊坊市、沧州市、扬州市。这些地区非遗的分布规模优于传统村落的分布规模,相较于传统村落资源,非遗资源更为丰富。正向低错位区包括焦作市、郑州市等7市。反向低错位区包括衡水市、开封市等15市。这些地区传统村落与非遗的错位程度不高,二者发展处于较低水平的协同发展状态。总体来看,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城市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空间错位类型以低错位类型为主,中高错位类型的城市数量较少,呈现“橄榄型”分布模式。

表1 传统村落与非遗分布的重心错位与偏离距离

地区	传统村落重心		非遗重心		偏离距离/千米
	经度(°E)	纬度(°N)	经度(°E)	纬度(°N)	
大运河文化带	116.640 115	34.235 811	117.477 042	35.315 335	151.772
北京市	116.189 291	40.134 681	116.390 599	39.947 275	30.559
天津市	117.446 072	39.929 964	117.221 345	39.160 216	89.097
邯郸市	114.005 05	36.550 72	114.622 755	36.583 107	68.728
廊坊市	—	—	116.538 45	39.328 407	—
邢台市	114.101 683	37.054 818	114.918 465	37.097 679	58.092
沧州市	—	—	116.749 26	38.259 696	—
衡水市	115.370 654	37.683 647	115.719 029	37.904 063	64.688
焦作市	113.092 343	35.187 13	113.134 858	35.131 99	7.736
郑州市	113.182 288	34.452 551	113.428 121	34.653 945	35.310
开封市	114.264 687	34.613 553	114.434 931	34.777 557	26.265
新乡市	113.756 158	35.666 627	113.904 31	35.316 689	42.223
安阳市	113.841 939	36.106 81	114.544 126	35.751 553	87.437
濮阳市	115.412 096	35.865 764	115.209 545	35.847 569	22.596
洛阳市	112.060 765	34.365 843	112.659 599	34.726 458	77.670
鹤壁市	114.159 298	35.845 499	114.557 335	35.686 362	47.629
商丘市	—	—	115.541 893	34.417 976	—
宿州市	—	—	116.899 193	33.927 296	—
淮北市	—	—	116.834 65	33.997 876	—
济宁市	116.710 702	35.343 384	116.667 022	35.640 365	33.352
聊城市	116.033 73	36.383 792	115.813 672	36.501 669	27.737
泰安市	116.766 362	36.026 348	117.156 9	36.088 83	43.944
枣庄市	117.440 09	35.050 725	117.354 753	34.985 337	11.945
德州市	—	—	116.597 591	37.420 854	—
苏州市	120.587 915	31.244 46	120.580 755	31.354 945	12.301
扬州市	119.452 394	32.752 177	119.447 247	32.423 501	36.524
镇江市	119.607 838	32.043 746	119.437 257	32.071 251	19.198
常州市	119.873 987	31.620 451	119.845 861	31.713 705	10.822
无锡市	120.053 477	31.458 669	120.171 486	31.489 671	13.557
徐州市	117.650 954	34.338 638	117.289 837	34.326 864	40.145
宿迁市	—	—	118.264 887	33.658 166	—
淮安市	118.549 967	33.126 747	119.007 466	33.433 584	61.207
绍兴市	120.616 101	29.639 378	120.616 438	29.915 354	30.664
杭州市	119.379 133	29.716 862	120.057 666	30.182 507	91.437
嘉兴市	120.636 952	30.580 08	120.780 509	30.704 731	21.124
湖州市	119.911 712	30.924 647	120.037 984	30.770 29	22.158
宁波市	121.489 221	29.558 081	121.532 228	29.714 189	17.991

表2 传统村落与非遗空间错位指数及类型

地区	SMI	Gi	类型	地区	SMI	Gi	类型
北京市	14.81	16.23	反向高错位区	济宁市	0.52	0.56	反向低错位区
天津市	6.20	6.79	反向高错位区	聊城市	1.40	1.53	反向低错位区
邯郸市	6.41	7.02	正向高错位区	泰安市	1.04	1.13	反向低错位区
廊坊市	3.59	3.93	反向中错位区	枣庄市	2.25	2.46	正向中错位区
邢台市	11.22	12.29	正向高错位区	德州市	0.65	0.71	反向低错位区
沧州市	3.10	3.39	反向中错位区	苏州市	0.10	0.10	正向低错位区
衡水市	0.96	1.05	反向低错位区	扬州市	2.71	2.97	反向中错位区
焦作市	1.19	1.30	正向低错位区	镇江市	0.37	0.40	正向低错位区
郑州市	0.58	0.63	正向低错位区	常州市	1.89	2.07	反向低错位区
开封市	1.12	1.22	反向低错位区	无锡市	0.06	0.06	正向低错位区
新乡市	2.11	2.31	正向中错位区	徐州市	0.89	0.97	反向低错位区
安阳市	4.94	5.41	正向高错位区	宿迁市	0.65	0.71	反向低错位区
濮阳市	0.75	0.82	反向低错位区	淮安市	0.96	1.05	反向低错位区
洛阳市	4.80	5.26	正向高错位区	绍兴市	1.10	1.20	正向低错位区
鹤壁市	4.69	5.14	正向高错位区	杭州市	3.98	4.36	正向中错位区
商丘市	0.65	0.71	反向低错位区	嘉兴市	1.03	1.12	反向低错位区
宿州市	1.47	1.61	反向低错位区	湖州市	1.06	1.16	反向低错位区
淮北市	0.16	0.17	反向低错位区	宁波市	1.82	1.99	正向低错位区

从贡献率角度来看,对大运河文化带传统村落与非遗空间错位贡献率最大的是北京市,为16.23%,其次为邢台市、邯郸市和天津市,分别为12.29%、7.02%和6.79%,4市贡献率之和达到了42.33%,将近1/2。贡献率较低的是淮北市、宿州市、郑州市等市,贡献率最少的是无锡市,仅为0.06%。由此可知,大运河文化带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空间错位主要由少数城市二者分布不均衡所致。

四、传统村落与非遗空间错位影响因素

1. 影响机理与指标选取

(1)自然环境因素。地形地貌是影响传统村落分布的根本因素,海拔高程不同,水热组合不同,传统村落的地理位置与集聚趋势会因此产生差异。已有研究表明,地形地貌也会对传统村落的原真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地形复杂,地势起伏较大的区域,与外界的交流匮乏,空间环境愈加封闭和孤立,从而有利于传统村落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与延续^[36]。降水量和气温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村落的聚集与再分布,适宜的气候条件对乡村居民正常生产生活至关重要。我国传统村落

大多分布在季风气候区,高温多雨,雨热同期,对农业发展十分有利^[16]。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地区多位于季风气候区内,舒适的生活环境与开展农业生产的便捷条件,吸引大批人口来此聚居,从而形成了众多的传统村落,非遗数量也因此较多。

(2)社会经济因素。经济发展是传统村落和非遗得以良好保护的基本保障,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影响着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方式,还影响着对传统村落和非遗保护资金的投入与保护力度的增加。

农村人口数量是传统村落得以保护和延续的基本条件^[36],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致使部分地区大量农村居民涌入城市,传统村落“空心化”现象突出,数量逐渐减少,基于传统村落形成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渐趋消亡。同时,由于城镇地区吸纳了非遗传承的主体,非遗文化随着非遗传承主体向城镇地区转移,使非遗文化在传统村落以外获得脱域化传承,客观上导致了二者空间错位情况的发生^[30]。

交通是传统村落与外界进行联系的桥梁媒介,一般表现为交通发达的地区与外界联系密切,开放程度高,旅游开发等对传统村落原真性与完整性的保护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因此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持续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另外,地方政府

专门性和脱域性的保护路径割裂了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空间联系^[30]。部分地方政府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对传统村落进行改建翻新,“修旧如新”,使传统村落的景观氛围不协调,同时,基于传统村落的非遗文化也因地理空间的破坏而消失。其次,对非遗的生产性保护、博物馆保护等使得非遗脱离了传统村落这一孕育和生存的原生土壤,加速了传统村落和非遗的空间错位。

(3)指标选取。综上,结合上述分析,借鉴学者的研究^[29-30, 37],选取地形地貌、气温、降水量3个自然因子作为自变量分析自然环境因素对传统村落与非遗空间错位的影响。选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城镇化率以及政府主导4个经济社会因子作为自变量分析社会经济因素对传统村落与非遗空间错位的影响因素(表3)。

表3 传统村落与非遗空间错位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影响因子	指标释义
自然因素	地形地貌	海拔(米)
	降水量	年平均降水量(毫米)
	气温	年平均气温(℃)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GDP(万元)
经济社会因素	城镇化率	常住城镇人口/城镇人口(%)
	交通	公路里程(千米)
	政府主导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万元)

2. 影响因素探测结果分析

利用地理探测器对各影响因子进行探测(表4), q 表示各探测因子影响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城市传统村落和非遗的错位程度, q 值越大,表示探测因子对空间错位的影响程度越高,反之,越低。总体来说,在探测的7种因子中,对传统村落与非遗空间错位影响由大到小排序为:政府主导(0.44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0.292)、地形地貌(0.284)、气温(0.073)、城镇化率(0.069)、交通(0.062)、降水量(0.052)。由此可以看出,社会经济因素对传统村落与非遗空间错位的影响大于自然环境因素,政府主导对于空间错位的影响程度最大,且 $P < 0.01$,表明政府主导和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空间错位显著相关,说明政府的调控作用以及对传统村落与非遗保护的资金支持是导致传统村落与非遗错位的主要影响因素。其次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达

地区尽管传统村落留存现状不如人意,但通过投入资金、发展文创产业等形式促使非遗在城镇地区“脱域化”传承,间接造成了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空间错位。社会经济因素中的交通因子相较于其他因子对传统村落—非遗空间错位的影响最弱。自然环境因素中的地形地貌对传统村落与非遗空间错位的影响比较强, P 在1%的水平上显著,地形地貌影响人们对居住地的选择,进而进一步影响着地方特色文化的演替与更迭。气温和降水量也对空间错位情况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表4 传统村落与非遗空间错位影响因素探测结果

影响因素	影响因子	q	P
自然环境类	地形地貌	0.284***	0.000
	降水量	0.052	0.273
	气温	0.073	0.145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0.292***	0.000
社会经济类	城镇化率	0.069	0.157
	交通	0.062	0.196
	政府主导	0.441***	0.000

注: *、* *、* *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上显著。

3. 影响因素交互作用分析

利用地理探测器对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进行探测(表5),结果显示,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对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空间错位影响大于因子单独作用,因子两两交互作用后呈现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型关系,不存在独立作用的因子,表明传统村落与非遗空间错位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非线性增强共有15对组合,分别是:地形地貌与降水量、气温、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交通;降水量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交通、政府主导;气温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交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交通;城镇化率与交通;交通与政府主导。影响因子两两交互后解释力大于单独作用之和。自然环境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进行交互作用后的解释力大于单独作用的解释力,自然环境因素通过影响社会经济因素从而对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空间错位产生影响。其余6对为双因子增强,解释力大于单独作用但小于两者解释力之和。由大至小排序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cap 政府主

导、地形地貌∩政府主导、气温∩政府主导、城镇化率∩政府主导、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降水量∩气温。社会经济因素内部和自然环境因素

内部交互作用大于单独作用时的影响力,政府主导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传统村落与非遗空间错位的影响不可小觑。

表5 传统村落非遗空间错位影响因素交互作用探测

影响因素	地形地貌	降水量	气温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城镇化率	交通	政府主导
地形地貌	0.284						
降水量	0.645	0.052					
气温	0.579	<u>0.114</u>	0.073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0.660	0.684	0.669	0.292			
城镇化率	0.633	0.516	0.474	<u>0.361</u>	0.069		
交通	0.547	0.253	0.209	0.674	0.419	0.062	
政府主导	<u>0.651</u>	0.559	<u>0.512</u>	<u>0.675</u>	<u>0.482</u>	0.602	0.441

注:字体加粗表示非线性增强,字体加下划线表示双因子增强。

五、讨 论

以大运河文化带沿线36个城市的传统村落和非遗为研究对象,对其空间特征和空间错位关系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影响二者空间错位关系形成的影响因素的讨论,结果发现二者在不同城市均存在一定的空间错位现象,社会经济因素是大运河文化带传统村落与非遗空间错位现象形成的主导性因素。传统村落与非遗在物理上的空间错位为表面现象,实质为将传统村落与非遗的内在联系人为割裂,忽略非遗的文化空间,将其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娱乐活动相分离。大运河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沿线形成了众多载有深厚运河情节的传统村落。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传统村落日渐成为历史记忆,所承载的非遗也因都市化浪潮出现“脱域化”保护倾向。这对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非遗的活态传承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也对运河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提出了挑战。应在正确认识大运河文化带传统村落与非遗空间关系的基础上,制定保护政策,构建协同发展、整体性保护的体制机制。

研究丰富了传统村落和非遗研究的视角,为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城市传统村落与非遗的整体保护提供了思路与依据,对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有重要的意义。但本研究也有以下不足:一是本研究只对传统村落与非遗的重心错位和空间错位指数进行分析,并没有对二者地理位置的错位情况及

演化规律做具体分析。二是研究只从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的7个因子分析了影响因素,难以对二者空间错位的形成与发展做出全面的概括,未来还应进一步探索影响因素,为二者协同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对策建议,以求运河文化资源能够更好地保护与传承,千年大运河生机焕发,文化自信进一步彰显。

六、结 论

本文综合运用核密度、重心模型、空间错位指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城市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空间错位关系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剖析,得出如下结论。

(1)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城市传统村落和非遗数量分布不均衡,地区分布差异明显。邢台市、安阳市等市为传统村落的优势分布区,北京市、杭州市等市为非遗的优势分布区。传统村落和非遗均呈集聚的分布态势,传统村落集聚程度表现出“中间高,南北低”的特征,形成了一个高密度核心分布区 and 一个小核心分布区。非遗集聚程度表现为“南北高,中间低”的特征,表现为一个高密度核心分布区 and 一个次高密度核心分布区。

(2)传统村落和非遗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错位特征,二者重心的连线近似直线,且偏离距离达到了151.772千米。沿线各市传统村落与非遗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偏离情况,其中,杭州市偏离程度最突出,焦作市偏离程度最小。

(3)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空间错位以低错位类型为主,传统村落与非遗在苏州市、济宁市、衡水市等处于较低水平的协调发展状态,中高错位类型的城市数量较少,呈现“橄榄型”的分布结构。

(4)传统村落与非遗的空间错位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自然环境的影响也包括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这其中,政府主导、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形地貌是影响传统村落与非遗空间错位的主要因素。

参 考 文 献

- [1] 中国政府网.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文化部 国家文物局 财政部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EB/OL]. [2012-04-24]. 国务院办公厅, http://www.gov.cn/zwggk/2012-04/24/content_2121340.htm.
- [2] 陈波, 徐若蓝. 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生产与价值生成——以二官寨为例[J]. 中国软科学, 2022(12): 61-71.
- [3] 唐承财, 刘亚茹, 万紫微, 等.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影响路径[J]. 地理学报, 2023, 78(4): 980-996.
- [4] 黄庭晚, 张大玉. 中国传统村落遴选指标与价值评价演变研究[J]. 城市规划, 2022, 46(10): 72-77.
- [5] 杨立国, 胡雅丽, 吴旭峰, 等.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过程与机制——以皇都村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5): 1164-1177.
- [6] 张俊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城镇化路径——以河州花儿为例[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6): 78-86.
- [7] 刘思宇, 王瑞慧, 杨茜好, 等. 云南省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综合评估——基于27个中国传统村落的实证研究[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54(5): 48-59.
- [8] 张莎玮, 方禹, 吴鼎航, 等. 广府地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演变、异变与突变[J]. 建筑遗产, 2022(3): 21-30.
- [9] 秦芳, 陈耀华, 李路平. 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的适应性治理策略——以普洱景迈山传统村落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23, 30(4): 105-113.
- [10] 张家其, 喻兴洁, 朱烜伯, 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旅游共生模式研究——以湖南省湘西州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3, 42(2): 100-105.
- [11] 杨立国, 胡雅丽, 吴旭峰, 等.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过程与机制——以皇都村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5): 1164-1177.
- [12] 王兆峰, 李琴, 吴卫. 武陵山区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图谱构建及特征分析[J]. 经济地理, 2021, 41(11): 225-231.
- [13] 李伯华, 李珍, 刘沛林, 等. 湘江流域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变异及其分异规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2): 362-377.
- [14] 袁超, 孔翔, 陈品宇. 建构主义下传统村落旅游者真实性体验研究——以呈坎村为例[J]. 旅游学刊, 2023, 38(5): 115-126.
- [15] 何艳冰, 周明晖, 贾豫霖, 等. 基于韧性测度的传统村落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以河南省为例[J]. 经济地理, 2022, 42(8): 222-231.
- [16] 张晓瑶, 陆林, 虞虎, 等. 中国传统村落分布特征与成因机制研究[J]. 世界地理研究, 2023, 32(4): 132-143.
- [17] 杨燕, 胡静, 刘大均, 等. 贵州省民族传统村落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6类民族传统村落[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2, 36(2): 178-185.
- [18] 郭永平, 行晓荣. 晋陕豫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39(2): 58-65.
- [19] 林琰, 李惠芬.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与活化路径[J]. 南京社会科学, 2023(3): 151-160.
- [20] 宋俊华. 可持续发展理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J]. 文化遗产, 2023(3): 1-8.
- [21] 焦念涛.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评价及影响因素——以山东省为例[J]. 社会科学家, 2022(11): 49-57.
- [22] 张魏. 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关系的系统分析[J]. 系统科学学报, 2022, 30(4): 78-83.
- [23] 刘宇青, 徐虹. 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和旅游开发助推乡村文化振兴[J]. 社会科学家, 2022(10): 69-75.
- [24] 赵博文, 李克军. 非物质文化遗产共生要素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J]. 广西民族研究, 2022(6): 137-145.
- [25] 林继富, 何佩雯. “二十四节气”的集体记忆与中华文化认同[J]. 广西民族研究, 2022(6): 83-92.
- [26] 张广海, 袁洪英.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时空分布特征及景区响应机制——基于网络文本信息挖掘与定量测度分析[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3, 42(1): 102-107.
- [27] 张涵, 刘会成. 粤港澳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

- 分布及其影响因素[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2, 41(6): 93-98.
- [28] 田磊, 孙凤芝, 张淑娴. 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2, 36(5): 186-192.
- [29] 田磊, 史冰心, 孙凤芝, 等. 黄河流域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相关性及其影响因素[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3, 37(3): 186-194.
- [30] 李如友, 石张宇. 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空间错位及其机理[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2, 38(5): 129-137.
- [3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EB/OL]. [2019-05-09].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 http://www.gov.cn/xinwen/2019-05/09/content_5390046.htm.
- [32] 梁龙武, 先乐, 陈明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人口与经济重心演进态势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2, 42(2): 93-103.
- [33] 王莎莎, 林珍铭. 桂林市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3, 37(5): 198-208.
- [34] 吴寒青, 张鑫, 刘倩倩.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安徽省旅游发展时空错位及影响因素分析[J]. 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2023, 46(1): 81-90.
- [35] 朱怡婷, 熊黑钢, 何昭丽, 等. 游览人数-景区收入重心演变与空间错位分析——以新疆热门景区为例[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54(4): 99-108.
- [36] 高楠, 邬超, 白凯, 等. 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48(4): 97-107.
- [37] 李如友, 石张宇. 黄河流域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关系及形成机理[J]. 经济地理, 2022, 42(8): 205-212.

Study on Spatial Mismatch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long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LI Jian-mei, ZHAO Miao-yi, LI 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long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are important cultural resources of the Grand Canal, and 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ditions for the vivid display and living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millennium Canal to clarify their spatial relationship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achieve thei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aking 36 administrative units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above along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as the research are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atial mismatch between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long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kernel density, center of gravity model, spatial mismatch index, geographic detector and so 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both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e clustered with the lower spatial overlapping degree of clustered distribution in the north. 2)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obviously deviated, and the deviation degree is fairly large with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3) The spatial mismatch between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ows an olive-shaped distribution pattern with the low mismatch as the main type and the medium-high mismatch as supplementary. 4) The spatial mismatch between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multiple factors. Among them,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involve the government lead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opography and geomorphology, and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actors is greater than that when they act alone.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spatial mismatch

【编辑 高婉炯】